

赵智滨◎编著

历史编年

百济

姜维公◎主编

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



科学出版社

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

姜维公◎主编

百济历史编年

赵智滨◎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百济于公元四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强势崛起,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颇具实力的国家,对东北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主要系统地收集了中、韩、日三国史籍和金石文中有关百济的史料。全书共分为绪论、正文、附篇三部分。绪论主要是阐述笔者有关百济起源的观点。正文内容为便利检索,按照百济本身历史发展的特点,分期按时间次序编排百济史料,分为五章,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8年至公元678年。附篇主要是收录对百济史料中无法编年的部分。鉴于中、韩(朝)、日三国史料中都存在着年代紊乱、真伪混杂的问题,书中对于明显有疑问的史料和部分百济地名的地望进行了分析和考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济历史编年/赵智滨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6

(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姜维公主编)

ISBN 978-7-03-049326-2

I. ①百… II. ①赵… III. ①渤海国-民族历史-编年史-古代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资料核字(2016)第151011号

责任编辑:董晓舒/责任校对:孙永凤

责任印制:徐晓晨/封面设计:八度出版服务机构

联系电话:010-64005207

电子邮箱:dongxiaoshu@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6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9

字数:46 000

定价:1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

编 委 会

主编：姜维公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吕 萍 刘立强 刘 炬 刘晓东 杨 军
李德山 郑春颖 姜维东 高福顺 蒋立文

序

中国东北古代史以其发展的特殊性，相较于中原地区，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不多，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由于资料稀缺，有些研究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编造史料。以高句丽史为例，十九世纪末，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其国家“大陆政策”指导下，抛出了“日鲜同祖论”和“满鲜一体论”，为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历史依据。由于这种荒谬的理论没有史实的依据，他们采取了歪曲乃至编造史料的手法，从而证明其理论的正确。具体做法就是抬高《三国史记》的历史地位，极力贬低中国正史的史料价值，通过考证将神话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资料肆意使用，这给高句丽史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与其进行学术观点的争论，不如潜心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我们的东北历史研究便从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等基础工作入手。在历史文献收集方面，2002年我校以“东北工程”委托项目为契机，成立了中国东北边疆历史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开始对东北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收集。在历史文献整理方面，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句丽渤海历史研究数据库”；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三国史记》笺证”；吉林省教育厅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东北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秽貊族系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各级研究课题。在历史文献考证方面，我们承担了教育部科研课题“明末《皇华集》研究”；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东北民族历史传说研究”、“高句丽历史文献编年”、“正史高句丽传校注”、“高句丽传说考源”等科研课题。通过考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三

国史记》存在大量史实错误，需要审慎运用，不可作为信史；高句丽传说乃属于传说的历史化，而非历史的传说化，因此没有历史研究之价值，日本学者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结论难以成立。长期的坚持不仅结出了一些学术成果，而且也形成一支研究队伍，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以史源学理论为指导，编写《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编年丛书》，经过课题组成员反复研讨，制定编写细则如下：

1. 凡政书、地理书率取材于正史，如悉数收录，未免重复叠沓，宜从史源学角度确定该史料的出处，在已收录的出处后加○号为区隔，加以简单史源学上的说明。

2. 夫余、高句丽、百济前史中颇抵触矛盾之处，非加考证无以辩明是非，故编年前宜有考证文字，至于考证之内容，则根据各自的特点而定。

3. 是编所收，主要以第一手、第二手（以今天视角而言）资料为主，至于第三手或第四手资料，除非有资说明或影响较大，可以在相关史料编年后加以标注说明外，一般不宜收入。以《三国史记》为例，其中资料多取资于《资治通鉴》，间有歧异的可以标注说明，至于所收高句丽、百济天象灾异之类，可以不收。

4. 虽然字面没有夫余（高句丽、百济同理）字样，但所载内容于了解时代背景、解决疑难有帮助的史文，也可酌情收入。如护东夷校尉等。

5. 附录所收无法编年的史料，宜分疆域、风俗、职官制度、行政设置、物产、山川、世系等，宜分项别类，复以史文编撰时间先后为次序收录之。至于《三国史记·地理志》所载高句丽、百济郡县设置，亦宜收入到行政设置中。

这套丛书既是我校前期工作的总结，也是我今后研究的基础，更希望能东北史研究者提供一些帮助。

姜维公

于长春师范大学

2016年3月25日

前言

百济利用永嘉之乱后西晋无力控制东北亚局势的良机，于公元四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强势崛起，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颇具实力的国家。在此后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百济在尊奉中原王朝的同时，与新罗、高句丽、倭国在东北亚进行激烈的角逐，直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被唐朝和新罗联合消灭。百济的建立、发展乃至灭亡，在东北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把百济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透彻，就不可能将公元四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清楚，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当时的中朝关系，对我国东北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高句丽问题亦难以完全考察清楚。

因此，研究百济史很有必要。然而，要深入研究百济史存在着很多困难。主要是现存的百济史料残缺不全，并分散在中、韩（朝）、日三国史籍当中，更为严重的是三国史料中都存在着年代紊乱、真伪混杂的问题。以记载百济历史最为系统的《三国史记》来说，其记载的百济早期纪事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如《三国史记》卷23《百济·始祖温祚王纪》记载百济始祖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率部众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迁移至西汉乐浪郡带方县所管辖的今韩国汉江流域时，玄菟郡、乐浪郡竟毫无反应，这与当时的东北亚局势完全背离，殊不可信。究其原因，因百济灭亡后其本身撰写的史书未能保留下来，成书于公元十二世纪的《三国史记》缺少史源，只能将一些并不可靠的神话传说和带有相当神话传说色彩的民间故事写入《三国史记》，以致其所记载的百济早期纪事与中国史籍记载以及考古成果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的日本史书《日本

书纪》中有关倭国与百济交往的史料主要参考了《百济记》、《百济本记》等百济方面的史料，日本学者上田正昭就认为，《日本书纪》的编撰者从以日本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改写了以百济为中心的《百济记》，因此《日本书纪》中有关倭济关系的纪事的基本情节还是有根据的。^①不过，《日本书纪》的早期编年存在着很大问题，部分日本和韩朝学者认为《日本书纪》早期历史编年被提前了两个干支，即120年。^②而中国的史籍中关于百济的史料虽然相对可靠，但主要侧重于百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关百济同高句丽、新罗、倭国的关系史料较少，且存在着一些史实错误，如《旧唐书·百济传》、《新唐书·百济传》中有关新罗攻陷百济故地的记载就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此外，金石文史料也是百济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依据。由于金石文是历史事件发生时或不久后留下的资料，因此其可信性相对较高。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好太王碑、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刘仁愿纪功碑等金石文材料都是百济研究的重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讲，中、韩（朝）、日三国史籍有关百济的史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不可偏废。

本书主要系统地收集了中、韩（朝）、日三国史籍和金石文中有关百济的史料。全书共分为绪论、正文、附篇三部分。绪论主要是阐述笔者有关百济起源的观点。有关百济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高句丽起源说、马韩起源说、卒本夫余起源说、夫余起源说等多种观点。经过对百济起源各种观点的仔细整理比对，笔者认为当前史学界较为流行的百济起源于高句丽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出土金石材料，笔者得出百济是于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从夫余政权中分裂出来的观点。百济最初位于沃沮故地，百济即为沃沮的异写，曾一度成为我国东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不久后为高句丽击败，被迫于公元四世纪中叶经东濊地区南迁位于今朝鲜半岛中部汉江流域的带方故地。

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是收录有关百济起源及其传说时代的史料，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8年至公元344年。第二章主要是收录有关百济在朝鲜半岛重新立国初期的史料，时间跨度为公元345年至公元475年。第三章主要是收录有关百济在朝鲜半岛立国中期的史料，时间跨度为公元476年至公元554年。第四章主要是收录有关百济在朝鲜半岛立国后期的

① [日本] 上田正昭：《日本の歴史2・大王の世紀》，东京：小学馆，1977年，第187—188页。

② [日本] 坂本太郎、井上光贞等校注：《日本书纪》上卷，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608页补注。

史料，时间跨度为公元 555 年至公元 658 年。第五章主要是收录有关百济灭亡前后和熊津都督府的史料，时间跨度为公元 659 年至公元 678 年。

附篇主要是收录对百济史料中无法编年的部分。

书中对于明显有疑问的史料和部分百济地名的地望进行了分析和考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由于本人学业不精，读书不广，必然会有一些重要史料未能收入，或者对史料的分析与考证有不周之处，敬请诸位师友方家批评指正！

凡 例

1. 有关百济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高句丽起源说、马韩起源说、卒本夫余起源说、夫余起源说等多种观点。为廓清迷雾，在编年文献之前另加绪论一章，以说明百济之起源。

2. 本编为便利检索，按照百济本身历史发展的特点，分期编排百济史料，分为五章。

3. 百济之疆域、物产、风俗等，虽有变迁痕迹可以考定，但列入篇中颇费周章，亦不便读者观览，兹为便利起见，于编年文献后另作“附篇”一章以收录。

4. 编年以中原统一王朝年号为主，以《三国史记》所载百济纪年为辅。《三国史记》所载百济早期纪年并不准确，有杜撰之嫌，但亦有参考价值，故列中原统一王朝年号之后。《日本书纪》的早期纪年存在着很大问题，且称倭王为天皇，倭国为日本（根据中日两国史学界的研究，倭国改称日本有确切记载是在公元701年《大宝律令》完成之后）。故本编对《日本书纪》所记载有问题的事件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年，至于更改理由，则在该条史料后所加的按语中有说明。为方便读者查找和避免混乱，不再更改《日本书纪》原有天皇名号，仍称日本某某天皇某某年，不称倭王某某年，列入《三国史记》所载百济纪年之后。如涉及割据政权或并立政权，则采用传统标法，兼具割据政权或并立政权年号。

5. 编年文献，自然以时间为次序，本编即以时间次序排列，以帝号纪年法为主，标注公元纪年。有约略年月或无具体年月但可推断大致时期之史料则酌情排列。考虑到百济史料多存于正史编年史，而且学者参考，亦

多先取正史，次取稗官杂记，故同一年内之史部文献史料排列顺序则按《四库全书总目》的史体次序来排列，即按照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史评的次序；在同一史体中，则以各史籍的成书时间先后为序。金石文字，率多墓志碑铭，斯亦史传之一体，其排列次序在传记一体中，同一年之次序则以志铭时间及关联性为前后。其他子部、集部文献史料排列于史部文献史料之后。

6. 有关百济汉籍史料除中国史籍记录外，韩日史籍亦多有收录，其中不乏有价值者。故本编将韩日史籍中有关百济史料一并收录。考虑韩日史籍多自成体系，故同一年韩日史籍史料排列于中国史料之后，其中日本史籍史料排列于韩国史籍史料之后，其内部排列顺序同于中国史籍史料。

7. 诸史多有前贤之注，故有参考价值者亦斟酌收录。

8. 百济灭亡后，唐在其故地设置扶余都护府、熊津都督府等行政建制。有关扶余都护府、熊津都督府之史事，亦酌加收录。

9. 百济毗邻之少数民族史料，能反映百济外部环境及相应影响者，亦酌加收录。

10. 凡叙百济史事者，稍有差异，悉录之备览。至于其他史料，主要择其纪事次序最先者或最完善者录之。

细则示例

1. 夫余、百济、高句丽前史中颇抵触矛盾之处，非加考证无以辨明是非，故编年前宜有考证文字，至于考证之内容，则根据各自的特点而定，本编考证部分为百济起源问题探讨。

2. 本编所收，主要以第一手、第二手（以今天视角而言）资料为主，至于第三手或第四手资料，除非有资料说明或影响较大，可以在相关史料编年后加以标注说明外，一般不宜收入。

3. 虽然字面没有百济字样，但所载内容于了解时代背景、解决疑难有帮助的史文，也可酌情收入，如熊津都督府等。

4. 附录所收无法编年的史料，宜分世系、疆域、行政设置、职官制度、风俗法律、气候物产、山川岛屿等，宜分项别类收录之。至于《三国志·地理志》所载所谓百济郡县设置，亦收入到行政设置一项。

百济起源问题探讨

百济政权位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的东北亚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有关百济政权的起源以及其是如何由中国东北迁移到朝鲜半岛的，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尚无定论。本文拟根据中外相关史料记载及出土的金石材料，对百济起源的史实做一重新考证，希望能够完整揭示百济起源的历史真相。

一、有关百济起源的四种观点

（一）高句丽起源说。首先是《三国史记·温祚王纪》记载：“百济始祖温祚王，其父邹牟或云朱蒙……温祚恐为太子所不容，遂与乌干、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遂至汉山，登负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也。”认为百济起源于高句丽，其他韩国史籍，如《三国遗事》等亦持相同观点，当代朝韩史学界及部分中国学者对此深信不疑，高句丽起源说成为当前中外史学界有关百济起源最为流行的观点。但该说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其与西汉末年的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形势明显相悖。公元前18年，温祚的迁移出发地高句丽侯国隶属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而温祚所迁移到的所谓“河南之地，北带汉水”，即今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隶属于西汉乐浪郡带方县，而从高句丽侯国到汉江流域必经今朝鲜半岛北部，而当时朝鲜半岛北部归乐浪郡管辖。温祚一行的出发地、中间路途、迁移地均在西汉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很难想象在当时西

汉王朝大一统的历史大背景下，温祚一行竟能做如此自由的迁移，最后还能建立独立政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缺少强有力的文献支持。《魏书·百济传》记载：“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百济王室认为其出自夫余，而非高句丽，这与《三国史记·温祚王纪》中百济王室出自高句丽的记载存在明显冲突。再次是没有强有力的考古证据。截至目前，有关百济的出土文物时间均不早于公元四世纪。在韩国汉江流域发现的建造年代在公元四世纪以前的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多为中原内地系统的文物。^① 综上三点来看，《三国史记》的百济开国传说恐怕只是后世的一个历史传说故事，不足为信。^②

（二）马韩起源说。《梁书·百济传》记：“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弁韩、辰韩各十二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马韩确有伯济国。《梁书》作者可能以此为据认为百济由马韩一国发展而来，但伯济与公元四世纪以后兴起的百济是否有继承关系，并无确切证据。马韩起源说与百济方面自称其出自夫余的说法明显相悖，同时马韩起源说也无法解释百济在公元四世纪频繁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史实，马韩起源说难以成立。

（三）卒本夫余说。姜维公、姜维东的《高句丽、百济起源新论》持此说，^③认为百济起源于今辽东之东的浑江地区的卒本夫余，卒本夫余后发展为高句丽五部的涓奴部。东汉末年演变为小水貊，后南迁朝鲜半岛建立百济。《三国志·夫余传》中所记的许多夫余史事都与夫余（北夫余）无关，而应该属于卒本夫余（涓奴部）。该说颇有新意，也很有启发性，但笔者认为这个观点还是有探讨空间的。首先《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本涓奴部为王，

① [韩国]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从中国文献古籍的记载来看，在韩国汉江流域发现的四世纪以前的城市遗址应当多属于带方郡，出土中原内地系统的文物十分正常。

② 刘炬：《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体系的几点看法》，《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三国史记》将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历史传说视为史实，以至当前高句丽史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不实之处。与此类似，《三国史记》也将有关百济早期历史的历史传说视为史实，因此以《三国史记》为核心的传统高句丽、百济早期史体系反应的未必是历史真相。

③ 姜维公、姜维东：《高句丽百济起源新论》，《东北亚研究论丛》2007年第1辑。



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三国志》称在桂娄部统治下的高句丽为夫余别种，很明显此夫余别种指的应是桂娄部而非涓奴部。唐代礼言在其《梵语杂名》中称高句丽为亩俱理，^①《后汉书·东夷传》记“句骊一名貊”，很明显高句丽原意应是指一支叫做句丽的貊人，“本涓奴部为王”表明涓奴部很可能就是原来居住在浑江中游（高句丽县辖境）的貊人，后来作为夫余别种的桂娄部来到高句丽县，取代了涓奴部的地位，并借用了高句丽的族名。桂娄部与夫余有渊源关系，涓奴部为貊人而非夫余人，因此小水貊（涓奴部）很可能自称句丽而绝不可能自称卒本夫余。其次是《三国志·夫余传》中所记的许多夫余史事确实是夫余（北夫余）的，陈寿并未混淆夫余（北夫余）与小水貊（涓奴部）的关系。当前史学界公认夫余政权中心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好太王碑》和《新唐书》称其为北夫（扶）余。^②姜维公、姜维东认为王颀根本没有必要远赴今吉林市，要求夫余配合其攻讨高句丽，同时路途遥远，夫余供应军粮不现实。^③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毌丘俭派王颀率魏军追击高句丽王位宫“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此时曹魏军已远离大后方转战数千里，后方供应困难是必然的，王颀军在未能消灭位宫的情况下退兵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夫余跟曹魏关系良好且离沃沮不远，王颀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向夫余征粮。而小水貊离玄菟郡很近，魏军在临近小水貊地区作战时其后方供给线较短，后勤压力不大，没必要向小水貊征粮。由此可见百济起源于小水貊（涓奴部）的可能性也不大。

（四）夫余说。许多中国正史典籍及日本的《续日本纪》持这一观点。《魏书·百济传》记载：“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隋书·百济传》记载：“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应即《论衡·吉验篇》中的橐离）。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橐离）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

① 付百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句丽史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

② 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411页；《新唐书》卷220《东夷传》。笔者认为北夫余名称的出现在四世纪中期，此前最好还应被称为夫余。

③ 姜维公、姜维东：《高句丽百济起源新论》，《东北亚研究论丛》2007年第1辑。

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北史·百济传》和《周书·百济传》与《隋书·百济传》相似，亦持夫余说。《续日本纪·桓武纪五》：“其百济远祖都慕王者，河伯之女感日精而所生……真道等，本系出自百济国贵须王。贵须王者，百济始兴第十六世王也。夫百济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灵，奄扶余而开国……”都慕王当即夫余东明王。同时百济出自夫余这种看法也得到了百济王室的认可，《魏书·百济传》记百济王余庆上北魏皇帝：“表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

《隋书》记百济先王仇台为夫余王，东汉末年的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仇台应为汉末时期的夫余王。《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从时间空间上来看，这个娶公孙度宗女的夫余王尉仇台与《隋书》记载的百济先王仇台的事迹高度重合。《三国志·东夷传》又记：“（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句丽呼相似为位。”夫余呼相似也当为位。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夫余王有嗣子尉仇台。位同尉，很可能夫余有先王仇台，故后王多有名尉仇台者，据此《隋书》中的夫余王仇台很可能名尉仇台，《隋书》中的百济先王仇台应该就是《三国志》中的夫余王尉仇台。实际上《通典·东夷传》就是如此记载的，“百济，即后汉末夫余王尉仇台之后，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自晋以后，吞并诸国，据有马韩故地。”由以上中国正史典籍和《续日本纪》来看，百济确实起源于夫余，后汉夫余王尉仇台为其血缘上的直系祖先，《三国史记》中的早期百济王系应该是以夫余王系为原型的。

二、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百济在沃沮故地独立建国

《三国志》中尉仇台所在的夫余，就是政权中心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夫余，史学界公认公元475年前，百济的中心区域位于今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而从今吉林省吉林市到汉江流域有数千里的路程，同时两者中间隔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聚居区，百济要完成如此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难度是非常大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学者对百济起源于夫余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主要原因。既然百济王系始祖为后汉夫余王尉仇台，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当时夫余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看百济是如



何从夫余中分化出来的。

《三国志·东夷传》记载：“（夫余王）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簿敛送官。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这段记载十分混乱，令人十分费解。刘子敏指出这段文字存在着错简问题，正确的记载应是：“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夫余王）尉仇台死，简位居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簿敛送官。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①复原后的文字，层次分明，逻辑清楚，当可信从。从复原后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汉末魏初的夫余政权尚未进入绝对王权时代，还处于贵族民主联合执政时代。百济先王尉仇台家族在夫余王权争斗中失败，大使位居在夫余贵族们的推举下成为夫余王，由于位居是由贵族联合推选继位，而非采取暴力手段夺权，再加上尉仇台家族与辽东公孙家族的亲戚关系，尉仇台子孙很可能并未被杀害，只是失去王位继承权，下降为一般大贵族。《三国史记·古尔王纪》记载，公元234年，百济仇首王病故，其弟古尔王夺侄王位自立。从仇首王的名字和所处的年代判断，其原型当是尉仇台，古尔王的原型当是位居，《三国史记》较为曲折的反映了这段历史。

《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六年（公元245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这场魏丽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战略格局，曹魏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局势。魏丽战争后，高句丽遭到了重创，但曹魏并未能消灭高句丽，为消除隐患、防止高句丽东山再起，曹魏在战后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高句丽的

^① 刘子敏：《三国志·夫余传中的错简问题探讨》，《东疆学刊》1997年第1期。